臺灣文學研究集刊　創刊號
2006年2月　　頁1~33
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

夏濟安、《文學雜誌》與臺灣大學——兼論臺灣「學院派」文學雜誌及其與「文化場域」和「教育空間」的互涉*

梅　家　玲**

摘　要

夏濟安所創辦的《文學雜誌》，是五〇年代臺灣最重要的文學雜誌之一。但過去論者對它的定位，多僅將它與五〇年代稍早的《自由中國》，及六〇年代之初的《現代文學》相聯繫。本文則擴大觀照視野，試圖由「文化場域」與「教育空間」互涉的角度切入，探討夏濟安及其所創辦的《文學雜誌》，是如何因為善用了「臺灣大學」——此一負有人才培育與學術研究雙重重任的教育空間——所提供的特殊資源及支援，促成當時文化場域的改變；而它又如何回饋到學院教育，為日後文化場域與教育空間的互動互涉再添動力，彼此對話交融，相生相成。此外，作為一份「學院派」雜誌，它賡續了抗戰前朱光潛所編《文學雜誌》之堅持文學的傳統，卻又在倡議「以文學理論誘導創作」、「歡迎翻譯作品」的理念下，別出於前者，轉而為臺灣開創了另一新傳統，因而在臺灣文學／文化史上，具有重大意義。

關鍵詞：夏濟安　《文學雜誌》　臺灣大學　學院派文學雜誌　教育空間　文化場域

94.12.5 收稿，95.1.5 通過刊登。

*本文初稿曾宣讀於 2005 年 10 月 28-29 日於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所舉行的「夏氏兄弟與中國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文中有關早期的臺大課程資料，由臺大中文所林姿君同學協助整理，謹此致謝。

** 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教授，與中國文學系合聘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先生棄世時，年僅四十九。就我所知，先生未寫過一本長篇小說，未實實在在的寫過新詩，未出版過一本文學研究的專書。然自大陸淪共後，不管在海外或在臺灣，在保持中國文學命脈，在栽培中國新作家方面，貢獻之大，近人無出其右者。

先生對中國文學之影響，當然是來自他所創辦的《文學雜誌》。《文雜》在一九五六年創辦之時，臺灣文化界中，難得有「文學」可言。報紙、雜誌和單行本所出版的小說，套用當時流行術語，不是「灰色」就是「反灰色」和「反紅色」。當然，這種「色素文學」在《文雜》出版以後，仍然繼續存在。不過，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在這種「黃鐘毀棄，瓦釜雷鳴」的氣氛中，一種嚴肅的研究文學的風氣是樹立了。

劉紹銘・〈懷濟安先生〉

有一天，在臺南一家小書局裡，我發現了兩本封面褪色，灰塵滿佈的雜誌《文學雜誌》第一、二期，買回去一看，頓時如綸音貫耳，我記得看到王鎮國譯華頓夫人的《伊丹傅羅姆》，浪漫兼寫實，美不勝收。雖然，我那時看過一些翻譯小說：《簡愛》、《飄》、《傲慢與偏見》、《咆哮山莊》等等，但是信手拈來，並不認真。夏濟安先生編的《文學雜誌》實是引導我對西洋文學熱愛的橋樑。我作了一項我生命中異常重大的決定，重考大學，轉攻文學。

白先勇・〈驀然回首〉

一九五〇年，時年三十四歲的夏濟安先生輾轉由香港赴臺，開始了他在臺灣大學外文系的教學生活。

夏濟安先生名澍元，以字行。一九一六年生於江蘇省吳縣，一九四〇年畢業於上海光華大學英文系。此後，曾分別任教於光華大學、中央軍校第七分校、西南聯大、北京大學、新亞書院等校，但都爲時甚短。在臺大擔任教職的時期，同樣不長：一九五〇年到職，一九五九年離校，中間還曾由臺北美國新聞處安排，前往美國印第安那大學研究院深造半年，專攻小說習作。留駐臺灣、任教臺大的時間，總計不到十年。然而，或許連他自己都意想不到的是，正是這十年不到的時間，讓他成就了「近人無出其右」的文化志業，對於戰後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灣的文學研究和創作，產生深遠影響。[1]

誠如劉紹銘先生所言，「先生對中國文學之影響，當然是來自他所創辦的《文學雜誌》」；藉著它「保持中國文學命脈」，「栽培中國新作家」。近年來，夏濟安先生及《文學雜誌》在臺灣文學發展過程中所開展出的各方面意義，已不斷引起研究者注意；[2]各派文學史家評論五〇年代臺灣文學時，儘管持論不一，但對夏及《文學雜誌》的高度肯定，卻是不約而同。[3]

這些肯定論述所著眼的，主要不外乎兩方面：一是在官方以強勢政策主導文藝發展的五〇年代裡，《文學雜誌》能以忠於「文學」的堅持，突破意識形態圈限，嚴肅地進行文學研究、翻譯與創作；二是發掘培養了白先勇、王文興、陳若曦等一批優秀青年作家，而這批年輕人，不僅合作創辦六〇年代最重要的文學雜誌《現代文學》，並且以其優異的創作成果，共同締造了臺灣現代主義文學的輝煌時代。換言之，《文雜》的貢獻，乃是「風氣的樹立」和「人才的栽培」。[4]

1 1959 年，夏濟安以美國洛氏基金會資助，再度離臺赴美，進行教學研究，從此留駐美國，未曾返臺。六年後，突發腦溢血，病逝加州。有關夏濟安先生的生平資料，請參見本文附錄一。

2 褚昱志，〈五〇年代的《文學雜誌》與夏濟安〉，《臺灣文學觀察雜誌》第 4 期（1991）；楊宗翰，〈《文學雜誌》與臺灣現代詩史〉，《臺灣文學學報》第 2 期（2001）；陳芳明，〈臺灣現代文學與五〇年代自由主義傳統的關係——以《文學雜誌》為中心〉，收入陳芳明，《後殖民臺灣》（臺北：麥田，2002），頁 173-196；許俊雅〈回首話當年——論夏濟安與《文學雜誌》〉（上）、（下），《華文文學》（2002）、（2003）；柯慶明〈學院的堅持與局限——試論與臺大文學院相關的三個文學雜誌〉，「文學傳媒與文化視界」國際學術研討會，2003 年 11 月 8-9 日；徐筱薇，《臺灣現代主義思潮之出發——以《自由中國》、《文學雜誌》為分析場域》（臺南：成功大學臺文所碩士論文，2004）等。

3 尹雪曼，《中華民國文藝史》即指出：「《文學雜誌》的創刊，促使我國的文藝由『戰鬥文藝』轉變到『純粹文學』的表現。」（臺北：正中，1975），頁 88；葉石濤，《臺灣文學史綱》也說：「五〇年代末期的《文學雜誌》的出現，的確扭轉了五〇年代閉鎖的文學風氣，提供了另一扇門，讓跟官方文學意見不同的作家發抒較不被束縛、自由、異質的文學理論和主張。」（高雄：文學界雜誌社，1987），頁 107；另如陳芳明〈臺灣新文學史第十三章：橫的移植與現代主義之濫觴〉，載於《聯合文學》202 期（2001），都是從正面肯定《文學雜誌》的意義。

4 這是劉紹銘論及《文雜》貢獻時所作的總結：「《文雜》於今已停辦多年，若對它的貢獻來個總結，相信沒有人會反對是風氣的樹立和人才的栽培。」見〈懷濟安先生〉，原載於《現代文學》第 25 期，後收入劉紹銘，《吃馬鈴薯的日子》（臺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然而，綜觀五〇年代的臺灣文化界，原也有若干風格自具、不與官方政策合轍的刊物，如《野風》、《自由中國》、《文星》等。當時這些雜誌的讀者人數，較《文學雜誌》尤有過之，[5]它們在「風氣的樹立」方面，未必沒有建樹；但若論及「人才的栽培」，便多有未逮；對臺灣文學界及學術界的影響，因此更不及《文雜》遠矣。箇中關鍵何在？很顯然地，主要因爲《文學雜誌》乃是以「臺灣大學」——這所匯聚了當時全臺灣最優秀的教授與學生、並且一直是臺灣最具指標性意義的大學——爲主要基地，而發展出的一份「學院派」文學雜誌。藉由此一雜誌，不僅成功地匯通了五〇年代臺灣的「文化場域」與「教育空間」，使二者所累積的成果得以相互轉化，彼此生發；同時，也爲其後另外兩份深具影響力的學院派文學雜誌：《現代文學》及《中外文學》，導其先路。

所謂「學院派」文學雜誌，乃是由學院中的教授文人所創辦，以學者及青年學生爲編輯及寫作主力，並且力圖將學院中的研究與教學成果，轉化爲出版文化產品，走出學院，進入一般閱讀市場，刊物因此多具理想性與學術性。《文學雜誌》、《現代文學》與《中外文學》，堪稱是半世紀以來，臺灣最重要的三份學院派文學雜誌；這三份雜誌，又全數都與臺灣大學文學院深有淵源。此一現象，絕非偶然。[6]也因此，這篇文章所進行的，便是擴大觀照視野，試圖由「文化場域」與「教育空間」互涉的角度切入，探討夏濟安及其所創辦的《文學雜誌》，是如何因爲善用了「臺灣大學」——此一負有人才培育與學術研究雙重重任的教育空間——所提供的特殊資源／支援，促成當時文化場域的改變；而它又如何回饋到學院教育，爲日後文化場域與教育空間的互動

北：晨鐘，1970），頁 145-160。

5 據吳魯芹之說，《文學雜誌》的主要風格在於「平實」，因此「當時的臺灣『文壇』，並沒有把這份刊物看在眼裡，大家也並不以為忤，而且還相當地 amused」。見吳魯芹，〈瑣憶《文學雜誌》的創刊和夭折〉，《傳記文學》第 30 卷 6 期（1977），頁 63-66。至於它的銷量，則每期「不過三五千份」，見彭歌，〈夏濟安的四封信〉，《中外文學》1 卷 1 期（1972），頁 108。反觀《文星》，甫出版即極具聲勢，四、五年之內，印數即從三、五千一直增加到一萬兩千多份，當時引人矚目的程度，遠過於《文雜》。

6 關於這一點，不少與這三份雜誌深有淵源的臺大中、外文系教師，其實都早有自覺。如 1988 年，中文、外文兩系即曾特別為此舉辦過座談會，由當時兩系主任林耀福、黃啟方共同主持，談論三份雜誌的興辦因緣及彼此間的多重關係。與會者包括外文系朱立民、顏元叔、王文興；中文系葉慶炳、林文月、曾永義、方瑜。見〈《文學雜誌》、《現代文學》、《中外文學》——對臺灣文學深具影響的文學雜誌〉，郭強生、林慧娥整理，《中央日報・副刊》（1988 年 11 月 17 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互涉再添動力，彼此對話交融，相生相成。

一、五〇年代的臺灣大學及其人文／文學教育

夏濟安是一九五〇年來到臺大的。在那個動盪的年代裡，他所進入的，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教育空間？

臺灣大學的前身，原是「臺北帝國大學」，一九二八年由日本政府在臺北設立。一九四五年臺灣光復，國民政府接收臺北帝大，遂改名爲「國立臺灣大學」。當時，臺大剛由傅斯年接掌校長一職不久，各項校務改革，經緯萬端，方興未艾；[7]不僅制度上已由原先日式三年制的講座大學，改爲美式四年的學院制大學，辦學的宗旨與理念，也與過去迥然不同。這一點，傅斯年〈國立臺灣大學第四次校慶演說詞〉，曾說明得很清楚：

> 日本時代這個大學的辦法，有他的特殊目的，就是和他的殖民政策配合的，又是他南進的工具。我們接收以後，是純粹的辦大學，是純粹的為辦大學而辦大學，沒有他的那個政策，也不許把大學作為任何學術外的目的的工具。如果問辦大學是為什麼？我要說：辦大學為的是學術，為的是青年，為的是中國和世界的文化。這中間不包括工具主義，所以大學才有他的自尊性。這中間是專求真理，不包括利用大學作為人擠人的工具。由日本的臺北帝大變為中國的國

7 日本政府設立帝大的目的，一方面在於以學術研究機構製造學術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則以高等教育機構養成專門人才，不但設備力求完備，師資素質亦堪稱良好，且明顯扮演日本南進政策輔助機關之角色；其學術研成果往往成為臺灣總督府和日本政府決策之重要參考，但對於提昇臺人教育水準則作用不大。參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的高等教育〉，《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第 25 期（1993），頁 154-156。臺灣光復之後，國民政府雖接收帝大，並改名「臺灣大學」，然因政局動盪，校務倥傯，不過三年期間，便三易校長。直到 1949 年，傅斯年先生受命接任臺大校長，力圖「於一年半內辦好臺灣大學」，堅持學術自由，並擬於最短期間內，將臺灣大學的學術水準提昇到全國第一；（見〈傅斯年簽出期票一紙，一年半內辦好臺大〉，《公論報》，1949 年 4 月 16 日），學校氣象，始得煥然一新。各項改革與發展方向的轉折，可參見《國立臺灣大學校史稿：（1928-2004）》（臺北：臺灣大學，2005）；歐素瑛，《傳承與創新：戰後初期的臺灣大學（1945-1950）》，（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博士論文，200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立臺灣大學，雖然物質上進步很少，但精神的改變，意義重大。[8]

傅斯年出身北大文科，早年曾與羅家倫等人共組「新潮社」，引領新文化運動。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他作爲三千學生愛國大遊行的總指揮，震驚中外，早就是引人矚目的學生領袖。赴英留學歸國後，歷任中山大學文學院長、北大教授、中研院史語所創所所長、北大代理校長等職。受命接長臺大之後，以其個人風範及學術界的聲望地位，戮力興廢，在臺大校務及教學研究方面，均多所改革；除倡議學術獨立、引進北大自由校風外，其中最重要的作爲之一，即是加強帝大時期曾被刻意壓抑的人文教育。

過去，帝大在自然科學方面卓有成就，但人文教育始終素質不高。除因殖民政策考量，有意壓抑外，師資匱乏，也是主要原因。因此文史、哲學及社會科學方面之研究成果有限，且欠缺自由思想的風氣。爲此，當時輿論還特別籲請臺大應訓練學生之國、英文閱讀能力，使其有機會接受新思想及新的思考方法，並養成自由思想風氣。[9]對此，傅斯年的具體作法是，一方面設法使臺大和已經遷臺的中央研究院合作，展開學術研究工作；另一方面，則多方延聘優秀的人文學科師資，如歷史學系的余又蓀、方豪、李濟、姚從吾、劉崇鋐、勞榦、傅樂成、陳奇祿；中文系的董作賓、伍俶、毛子水、孫云暹；外文系的英千里、沈亦珍、張肖松等，都是在一九四九年春，應傅校長之聘而至者。[10]

傅斯年深受自由主義影響，注重以「人」爲本的教育。落實在教學實踐上，首先便是「充實學校文理兩院的通習科目（即今「共同科目」及「通識科目」），務使學生「一進大門，便得到第一流的教授教他們的普通課」。[11]語文與文學是人文教育的重要基礎，大一國文與英文共同科目的設置及教學情形，因此特別受到關注。如一九四九年學年開始，傅校長即親自召集大一課程有關各學系教授副教授講師聚談，明訂大一國文之目的爲：（一）使大一學生因能讀古書，可以接受中國文化；（二）訓練寫作能力。並且選定《孟子》、《史記》兩書爲課本，另選宋以前詩爲補充教材，選印《白話文示範》爲課外讀物。英文方面，則分授文法與讀本，「務使大一新生，在一年之內，將第一種外國語打定一堅實基礎」。[12]

傅斯年雖在一九五〇年底即猝然棄世，但他任內所揭櫫的理想及訂定的制

8 《臺灣大學校刊》第 45 期（1949）。

9 〈談本省教育〉，《公論報》（1948 年 7 月 6 日）。

10 〈國內碩彥咸集本校・風雲際會盛極一時・新聘教授近四十名〉，《臺大校刊》第25期（1949）。

11 〈傅斯年先生傳〉，《國立臺灣大學校史稿》（年份），頁454-455。

12 《臺大校刊》第38期（1949）、45期（194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度，卻影響深遠。特別是文學院，「國內碩彥咸集本校・風雲際會盛極一時」，當年許多北大名師，都來此任教，並且親自擔任大一國文與大一英文的授課工作。[13]此外，文學院學生規定還有其它若干共同必修科目，授課者同樣都是一流教授，如中、外文系「世界通史」皆由沈剛伯講授；「理則學」老師是陳大齊；中文系「中國通史」老師爲勞榦，外文系「哲學概論」老師是方東美等。[14]

也就是在這樣一種強調學術自由獨立、看重人文教育的學術環境與教學氛圍中，夏濟安來到了臺大外文系。

第一年，他被指派擔任兩班共同科的英文課程；第二年起，則陸續爲外文系開授專業科目，包括翻譯、小說選讀、英國文學史等。外文系的前身，原是臺北帝大「文政學部文學科」中的「西洋文學講座」，一九四七年，始獨立成爲「外國文學系」。一九五五年，更名爲「外國語文學系」。五〇年代的臺大外文系課程，實以「學英文」爲主。李歐梵曾回憶當時的學習情況：

> 作為主修西方文學的我們，主要的外國語文是英文。……在臺大，我們四年的課程都在學英文——大一英文，大二會話與文法，以及英國文學史的課程，大三英國散文與小說，大四戲劇與翻譯——我們被引導以英美文學為主要研究對象。並且課堂上指定閱讀的文本主要是十八、十九世紀的作品，上起課來不免無聊〔比如，仔細閱讀的 Thackeray《浮華世界》（*Vanity Fair*）及哈代的《故里人歸》（*The Return of the Native*）〕。[15]

不過，這裡的「學英文」，其實仍多是由文學作品的解讀入手。綜觀當時外文系，四年中必修課程除「英語語音學」、「演說與辯論」屬於應用語文性課程外，其它如英國文學史、英文散文選讀及習作、小說選讀、戲劇選讀、英詩選讀、西洋文學名著選讀等，都是文學性課程，只不過「主要是十八、十九世紀的作品」，欠缺對西方現當代文學作品的引介。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一以「學英文」爲主要目標的教學設計中，外文系卻從三十八學年度（一九四

13 據臺大課務組課程表，38學年度（1949年秋）的大一國文授課教師包括臺靜農、毛子水、洪樵（炎秋）、孫云遐、何定生、董同龢、黃得時、史次耘、劉仲阮、王叔岷、屈萬里等多人；大一英文則有羅素英、傅從德、白靜明、趙經義、俞大采、黃瓊玖、黃國安、曹文彥、朱謹章、張肖松、萬國錚、錢歌川等。

14 參見38、39學年度臺大課程表。

15 李歐梵著，林秀玲譯，〈在臺灣發現卡夫卡：一段個人回憶〉，《中外文學》第30卷6期（2001），頁17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九年秋）開始，便商請中文系主任臺靜農先生，爲大二學生開授一學年六學分的必修課程「中國文學史」（與中文系大二合班）；而素來重視文字、聲韻等小學訓練的中文系，也在四十學年度（一九五一年秋），將全年六學分的「英國文學史」列爲大三大四生的必修課程，並由外文系主任英千里先生授課。兩系互以對方「文學史」課程爲必修課的規定，前後持續長達十年之久，恰恰縱貫了整個五〇年代。[16]

此一情形，顯示早年臺大中文、外文兩系在課程安排上，實有相輔相成，彼此交流匯通的用心，並且意味了所謂「文學」的教育，原就需要兼攝中西，相互映照。經由前述課程安排，不僅兩系學生，都能分別得到相對完整的中西文學訓練，兩系師生，也因此多有互動。而這一切，正所以爲日後《文學雜誌》兼重中西文學傳統的論述特色，奠立良好基礎。

二、《文學雜誌》：文化場域與教育空間的互涉

（一）《文學雜誌》：《自由中國》的純文學版？

《文學雜誌》係由夏濟安、劉守宜、吳魯芹三人共同創辦；夏任主編，劉爲經理，海外稿件由宋淇負責，吳則幫忙籌募經費。一九五六年年九月創刊，一九六〇年八月停刊。前後發行四年共四十八期。從一開始，它便強調「讓我們說老實話」，並且希望：「讀者讀完本期本刊之後，能夠認爲這本雜誌還稱得上是一本『文學雜誌』」。[17]這些訴求，在反共文學當道的五〇年代裡，確乎獨樹一幟，贏得各方肯定，自非偶然。

不過，在既有的相關研究中，論者多會強調它與《自由中國》——特別是其中由聶華苓主編之「文藝欄」的密切關係，進而據此申言臺灣五〇年代「自由主義傳統」與六〇年代「現代主義文學」之間的關聯與轉折。此說由朱雙一

16 外文系的「中國文學史」必修課程，至1959年暫且告一段落，前後持續計有十年之久；中文系則於次一學年度起，以「西洋文學史綱」（與外文系大一合班），取代「英國文學史」，作為大三必修課程，仍由英千里授課。之後，該課程雖有兩年由郝繼隆開授，但作為中文系的必修課，同樣持續了十年之久。

17 關於創辦原委及刊行過程，可參見吳魯芹，〈瑣憶《文學雜誌》的創刊和夭折〉，《傳記文學》第30卷6期，頁63-66。應鳳凰，〈劉守宜與「明華書局」、《文學雜誌》〉（上）、（下），《文訊月刊》20期（1985），頁321-330、21期（1985），頁309-318。其雜誌理念及特色的分析，可參柯慶明，〈學院的堅持與局限——試論與臺大文學院相關的三個文學雜誌〉。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首開端緒，其後論者，大多踵武其說：[18]

> 據筆者粗略統計，曾在《自由中國》發表文學作品的，約有一半人而後又在《文學雜誌》上出現，達三四十人之多。……
>
> 從發表作品的思想內容、藝術風格以及作品的相互評論等情況看，更可確認兩刊之間的緊密關係。如果說《文學雜誌》乃《自由中國》的純文學版，《自由中國》為《文學雜誌》開了先河，也許不會太過離譜。

證諸聶華苓、彭歌等人的回憶文章，朱說應屬持之有故。如聶華苓即曾清楚提到：

> 臺灣五十年代的「文化沙漠」的確寂寞，為《自由中國》寫稿的一小撮作家，常常聚在一起，喝杯咖啡，聊聊天，後來由周棄子先生發起，乾脆每月聚會一次，稱為「春臺小集」。……
>
> 「春臺小集」幾經滄桑，最初參加的人除了周棄子、彭歌、琦君與我之外，有郭衣洞、林海音、郭嗣汾、司馬桑敦、王敬羲、公孫嬿、歸人，後來郭衣洞突然放棄了我們；司馬桑敦去了日本；王敬羲回了香港。夏濟安、劉守宜、吳魯芹創辦了《文學雜誌》，「春臺小集」就由劉守宜「包」了，每個月到他家聚會一次。我們也就成了《文學雜誌》的撰稿人。記得彭歌的〈落月〉是在《自由中國》連載的；夏濟安對〈落月〉的評論是在《文學雜誌》發表的。後來夏道平也參加了「春臺小集」。一九六〇年，《自由中國》被封，雷震先生被捕，「春臺小集」就風消雲散了。[19]

彭歌也曾述及：

> 臺北本來有幾位文友，每隔一二個月輒有小聚，大家輪流作東，吃吃小館談談天，所談自以文學寫作方面者為多。這是一個十分不拘形跡的集會，來來往往，參加的人也並不一定。記得最早的幾位，有郭嗣汾、現在東京的司馬桑敦、到美國去的聶華苓、何凡與林海

18 朱雙一，〈《自由中國》與臺灣自由人文主義文學脈流〉，收入何寄澎編，《文化・認同・社會變遷：戰後五十年臺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文建會，2000），頁95。其後陳芳明、許俊雅、徐筱薇等人的研究，皆從此。

19 見聶華苓〈爐邊漫談〉，收入柏楊編，《對話戰場》（臺北：林白，1990），頁31-3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音夫婦，李唐基與潘琦君夫婦，詩人周棄子。後來又有從香港來的南郭、從中南部來的孟瑤與高陽，在臺北的潘壘、王敬羲、張明、公孫嬿。另外「偶爾參加」的還有王藍、余光中等許多位，再就是吳魯芹與劉守宜。《文學雜誌》創刊之後，這一群朋友便自然地與濟安先生常常見面，偶爾寫寫稿，或為他出出主意。[20]

不過，仔細玩味，雖然聶、彭兩人都提到《自由中國》與《文學雜誌》成員間的交往狀況，聶華苓並以「春臺小集」串聯起兩刊物間的密切關聯，然而彭歌的敘述，並不強調《自由中國》，反以《文學雜誌》爲中心，勾勒出五〇年代臺灣某一文學群體的交遊圖貌，這一敘述重點的轉移，或許有助我們從「文壇」，或者說，「文學場域」的角度，重新檢討兩份雜誌間的必然關係 —— 在時處「文化沙漠」的五〇年代，能自由發表純文藝創作的刊物本來爲數不多，無論是聶華苓所稱的「春臺小集」，抑是彭歌所說的「臺北文友」，其實都是活躍於當時藝文界的、具有高度自由創作意識的主力寫作群，他們是「文壇」的中堅份子，作品原就散見於各文藝刊物；而各（性質相類的）刊物之間，也就很自然地分享著相近的作者群，彼此縱橫交錯，共同形構出「文化場域」的各色圖景。對這些理念接近的文人而言，《自由中國》和《文學雜誌》固然是重要的發表園地，但並不以此自限。特別是，若檢視當時另一份始終宣稱「不按牌理出牌」、具有強烈自主意識的雜誌《文星》，[21]便會發現：經常爲它供稿的文藝作者，無非就是聶華苓、何凡、林海音、余光中、夏菁等人；其它以非藝文性稿件而與《自由中國》或《文學雜誌》重疊的作者，也所在多有。[22]此一現象，適所以提醒我們：若一味著眼於《自由中國》和《文學雜誌》作者之「同」，從而認定「《文學雜誌》乃《自由中國》的純文學版，《自由中國》爲《文學雜誌》開了先河」，未免失之於見樹不見林，並且窄化了《文學雜誌》的重要性和開創性意義。

正是如此，本文無意否認《自由中國》與《文學雜誌》之間的深厚淵源，但所關注的，無寧是二者之「異」——也就是在重疊的作者群之外，《文學雜誌》是如何引進不同於《自由中國》，以及其它文藝雜誌的異質成分，從而開展自我獨特的走向，並循此完成它的文學史意義。顯然，這些異質成分，正是

20 彭歌，〈夏濟安的四封信〉，《中外文學》1卷1期（1972），頁109。

21 《文星》是五、六〇年代深具影響力的另一份藝文刊物，創刊於1957年11月，發行人葉明勳，社長蕭孟能。創刊號以〈不按牌理出牌〉作為發刊詞，該文作者即為何凡（夏承楹）。1959年12月，該刊發行進入第三年之初，再次以〈不按牌理出牌的繼續嘗試——「文星」踏進第三年〉標舉理念。

22 如胡秋原、梁實秋、毛子水、黎烈文等。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源生於當時最具影響力的人文／文學教育空間——臺灣大學文學院；它的引進者，就是夏濟安。

（二）從臺灣大學到《文學雜誌》：教育空間的位移

夏濟安先生鄉音頗重，講學不暢，雖然滿腹經綸，作爲臺大教師，課堂上正式授課並不十分成功。初入臺大不久，甚至還有學生聯名寫信給外文系主任英千里，表示不滿。可是他平易近人，博學風趣，尤其批改學生英文作文，每每點石成金，令人折服不已，因此不多時，便深受學生愛戴。[23]儘管如此，他一生最大成就，畢竟不在現實的杏壇，而是藉由《文學雜誌》，將學院中的研究與教學成果，成功地轉化爲閱讀市場中的文化產品，讓大學人文／文學教育，突破學院門牆的局限，面向社會大眾，產生開放性的位移。

此一位移，首先反映在稿件取向及撰稿者的教授身份上。《文學雜誌》兼收文學評論、翻譯，與創作，但徵用稿件，顯然特重論著：

> 本刊歡迎投稿。各種體裁的文學創作與翻譯，希望海內外作家譯家，源源賜寄，共觀厥成。
>
> 文學理論和有關中西文學的論著，可以激發研究的興趣；它們本身不是文學創作，但是可以誘導出更好的文學創作。這一類的稿件，我們特別歡迎。[24]

檢視六卷凡四十八期《文學雜誌》所刊登的篇章，篇數固然還是以各類創作居多，但每一期，必然會選擇一篇極有份量的「有關中西文學的論著」，作爲全刊開篇之作。[25]如創刊號首排，便是勞榦的論文〈李商隱燕臺詩評述〉；之後二、三期，首篇分別是梁實秋〈文學的境界〉、Robert Penn Warren原作，張愛玲譯〈海明威論〉。第四期的首排之作，則是臺大中文系主任臺靜農以「白簡」爲筆名所撰寫的〈魏晉文學思想的述論〉。同期，還有勞榦〈論文章傳統的道路與現在的方向〉、葉慶炳〈賺蒯通雜劇〉。《文學雜誌》大量刊登臺大中文系教師的古典文學論文，便是自此期開始。

除首排論文外，其它沒有編排在首篇，同樣極具重要性的論文，當然還所

23 分見賈廷詩，〈憶夏濟安師〉、侯健，〈紀念夏濟安先生〉，二文俱收入夏濟安先生紀念集編印委員會編，《永久的懷念》（臺北：濟安先生紀念集編印委員會，1967），頁61、39。

24〈致讀者〉，《文學雜誌》1卷1期（1956），頁70。

25《文學雜誌》每期都以重量級的文學論著，作為該刊首排，詳見本文附錄二。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在多有。包括：夏濟安援用西方文學批評方法評論本地作品的重量級論文〈評彭歌的「落月」兼論現代小說〉（一卷二期）、〈白話文與新詩〉（二卷一期）、〈一則故事‧兩種寫法〉（五卷五期）、白簡（臺靜農）〈關於李白〉（四卷三期）、葉嘉瑩〈從義山嫦娥詩談起〉（三卷四期）、Stephen Spender著，朱乃長譯〈論亨利詹姆士的早期作品〉（四卷五期）等。這些論述或作或譯，全數出自名家手筆，其中又以臺大中、外文兩系教師，佔了絕大多數。如隸屬外文系者，有夏濟安、吳魯芹、黃瓊玖、張沅長、英千里、朱立民、侯健、朱乃長等；中文系有臺靜農、鄭騫、葉慶炳、林文月、許世瑛、廖蔚卿、葉嘉瑩、王貴苓等。此外，勞榦、沈剛伯時爲臺大歷史系教授，梁實秋、余光中任教於師大、東吳；再加上任教於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的夏志清、柏克萊大學的陳世驤、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的高格（Jacoborg），學界碩彥，可謂盡萃於斯。

事實上，能夠擁有如此堅實眾多的學界菁英作者群，正是《文學雜誌》與當時其它文學雜誌最大的不同處。而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自著，抑或翻譯，出自這些學院教授之手的篇章，多數與各人當時的任教課程有關，間或有個人學術研究所得者。以中文系教師爲例，臺靜農長年開授「中國文學史」，鄭騫開授「詞曲選」、「小說戲劇選」、「宋詩選」；所發表的古典文學評論，都是當時所授科目中的講授課題；外文系方面，夏濟安、吳魯芹、[26]侯健三人先後都開授過「翻譯」、「翻譯與寫作」、「小說選讀」等課程；黎烈文多年來一直是「法文」、「法國文學」、「法國文學名著選讀」的專任教師；黃瓊玖開授「戲劇選讀」；朱立民開授「美國文學」，他們在《文學雜誌》發表的譯作及評論，幾乎都是以自己任教的課程爲中心，衍生而出者。特別是夏濟安，其英文譯筆優美流暢，向爲眾所公認，創刊號以齊文瑜筆名，親自操觚，翻譯霍桑〈古屋雜憶〉，不啻現身說法，爲所開授的「翻譯」課程，作出最佳的示範性操作。

此外，還特別提得一提的，是陳世驤。他的力作〈中國詩之分析與鑒賞示例〉，將中西文學相互對照，不僅援引西方「靜態悲劇」的觀念來詮解杜詩，並以「新批評」的方法與文類觀念分析〈八陣圖〉，爲中國古典文學研究開拓新視野，《文雜》四卷四期刊出之後，影響深遠。但事實上，這篇論述，乃是

26 吳魯芹本名吳鴻藻，與夏濟安同為《文學雜誌》創辦人之一，向來以散文名家。《文學雜誌》時期，他自謂只負責籌募補助款項，一般人因此往往忽略了他原也是臺大外文系的教授。1954至1961年間，他在臺大外文系開授的課程計有「新聞英語」、「文學批評」、「翻譯」、「小說選讀」、「翻譯與寫作」等多種。五〇年代期間，他和夏濟安在臺大外文系的授課情形，請見附錄三。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陳世驤當年在臺大文學院的演講稿——陳教授於一九五八年五月返臺，兩週之內，在臺大文學院做了一系列關於中國詩學的密集講座，六月七日第三場，演講的題目正是〈中國詩之分析與鑒賞示例〉。[27]

因此，當陳世驤的演講以文稿形式，刊載於《文學雜誌》時，其實正是以更具體的行動過程，呼應了前述中、外文系教師爲該雜誌撰稿的意義：大學中，無論是常設課程，抑是特邀的學者講座，只是作爲特定學院教育的一環，所面對的，原本僅僅是該院校中的學生。然而一旦將它文字化，並以出版品的形式進入閱讀市場後，遂無形中將學院的教育空間開放、位移至社會文化場域，使之產生更具延擴性的效應，如此，「誘導出更好的文學創作」，庶幾可期。

與此同時，學院中年輕同仁及學生們的研習成果，也得以藉由這一經過位移後的開放性空間，公開體現。前曾述及，五〇年代臺大的「文學」教育，原就以兼攝中西爲理想。中、外文系互相必修對方的文學史課程，合班上課，是爲兩系互動，提供良好基礎。夏濟安主編《文學雜誌》，更增添雙方合作機會。更何況，對於《文雜》，夏先生自始便期待「真正有現代的眼光，能融合中西，論評中國舊文學的人」，[28]創刊號起，便多有討論中國古典文學的論文，這當然需要中文學界大力支援。對此，臺大中文系臺靜農、鄭騫、許世瑛等資深教授都以身作則，共襄盛舉；年輕講師以葉慶炳先生最爲熱心，除不時自己提交論文外，還鼓勵系內研究生投稿，發表讀書心得。如林文月，當年仍是臺大碩士生，她的古典文學研究論文，所以頻頻在《文雜》刊出，葉慶炳先生，實功不可沒。[29]

此外，由於當年外文系大一國文課程，恰巧由葉慶炳擔任，葉同時藉此幫忙發掘優秀的創作。現今的成名作家陳秀美（若曦）、白先勇、王文興等，當年都是外文系學生，他們的小說，原先不過是當年的課堂習作，經葉推薦給夏濟安先生，經過精心刪修之後，才逐一於《文雜》發表。這一點，葉先生本人

27 據〈中國詩之分析與鑒賞示例〉文後〈編者附言〉（《文學雜誌》4卷4期），美國加州大學教授陳世驤先生1958年5月返國，在臺灣大學演講四次，講題及日期分別是：第一次，5月31日，〈時間與節律在中國詩中之示意作用〉；第二次，6月3日，〈論中國詩原始觀念之形成〉；第三次：6月7日，〈中國詩之分析與鑒賞示例〉；第四次，6月10日，〈宋代文藝思想之一斑〉。

28 彭歌，〈夏濟安的四封信〉。《中外文學》1卷1期（1972），（頁碼）。

29 〈《文學雜誌》、《現代文學》、《中外文學》——對臺灣文學深具影響的文學雜誌〉。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曾言之甚詳：

> 我和外文系結緣要從夏濟安先生主編《文學雜誌》說起。那時我和夏先生在臺大單身教員宿舍對門而居，我常把我所教的大一國文班上看到的好作文推薦給夏先生。夏濟安先生的書案我至今記得，永遠是亂得無一方可供讀寫之地，然而有許許多多當今文壇上赫赫有名的作家，是當年夏先生在那張案前埋頭審稿、修稿時發掘的。
>
> 像是陳秀美，就是後來寫《尹縣長》的陳若曦，她那時有一篇作文我覺得不錯，便拿給夏先生過目。雖然夏先生認為作者的文字還不夠成熟，但是頗具潛力，於是將作品刪修後便刊載於他主編的《文學雜誌》上，這是陳若曦初試鶯啼之作。之後她又有一篇〈欽之舅舅〉，大獲夏先生激賞，一字未改便予以發表。另外還有一位同學的作品，我已經記不得名字了，本來說的是一則非常老套的愛情故事，一個窮學生給有錢人家的小姐做家教，然後兩人墜入愛河云云。經過夏先生的整修後，愛情事件全部化為男主角的想像，時空也濃縮在他第一次去上課的途中。等到他見到了那位富家女，才發現對方十分醜肥，他的幻想因此全部破滅。夏先生對小說技巧的運用掌握可見一斑，尤其處理來稿的審慎態度更非一般人所能及。[30]

當然，夏之審慎處理來稿，並不限於臺大自己的學生，如名家林海音，同樣對此感佩不已。[31]然而對於學生，他總是格外用心，這當與夏對《文雜》的理念有關。與夏有師友之情的劉紹銘先生，曾爲文引述夏的說法：

> 我辦《文雜》非為名，更非為利，因此作為編輯的最大安慰是登載一些優秀的稿子。同學投稿，稿子太壞，退稿時雙方不會傷感情。如果稿子還可以，那麼我可以替他動手術修改。我是臺大講師，責任是改同學的文章，因此即使在必要時刪去一大半，他也不能懷恨在心。……

因此，「《文雜》內容雖常參差，然每期中總有一兩篇上好的短篇小說，

30 同前註，〈《文學雜誌》、《現代文學》、《中外文學》——對臺灣文學深具影響的文學雜誌〉。

31 林海音，〈小說家應有廣大的同情——悼念夏濟安先生〉曾提到：「王敬羲曾告訴我：『夏先生為了修改你的稿子，整整用了全上午的時間。』果然〈瓊君〉刊出後，硬是把其中的一個人物取消了，銜接的工作，當然要因而費一番手腳的了。」，收入《永久的懷念》（臺北：濟安先生紀念集編印委員會，1967），頁21-2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而好的短篇小說，常來自臺大的同學」。[32]

至於因爲閱讀《文雜》而毅然重考大學，進入外文系的白先勇，更生動地記下他主動找夏先生投稿的經過：

> 進入臺大外文系後，最大的奢望便是在《文學雜誌》上登文章，因為那時《文學雜誌》也常常登載同學的小說。我們的國文老師經常給《文學雜誌》拉稿。有一次作文，老師要我們寫一篇小說，我想這下展才的機會來了，一下子交上去三篇，發下來厚厚一疊，我翻了半天，一句評語也沒找到，開頭還以為老師看漏了，後來一想不對，三篇總會看到一篇，一定是老師不賞識，懶得下評。頓時臉上熱辣辣，趕快把那一大疊稿子塞進書包裡去，生怕別人看見。「作家夢」醒了一半，心卻沒有死，反而覺得有點懷不遇，沒有碰到知音。於是自己貿貿然便去找夏濟安先生，開始還不好意思把自己的作品拿出來，藉口去請他修改英文作文。一兩次後，才不尷不尬的把自己一篇小說放到他書桌上去。我記得他那天只穿了一件汗衫，一面在翻我的稿子，煙斗吸得呼呼響……，我的心直在跳，好像在等法官判刑似的。如果夏先生當時宣判我的文章「死刑」，恐怕我的寫作生涯要多許多波折，因為那時我對夏先生十分景仰，而且自己又毫無信心，他的話，對於一個初學寫作的人，一褒一貶，天壤之別。夏先生卻抬起頭對我笑道：「你的文字很老辣，這篇小說我們要用，刊登《文學雜誌》上去。」那便是〈金大奶奶〉，我第一篇正式發表的小說。[33]

由此可見，從課堂講授，到研習成果；從學術論文，到文學創作，以臺大文學院爲主的師生們，便是如此這般地經由《文雜》，將原先學院中的所教所學，推移到開放性的出版市場之中，爲當時的文化場域，經營出深具學院性格的教育空間。在那個風聲鶴唳，一切文藝以反共國策爲依歸的五〇年代裡，這一批來自學院的作者及其相關書寫，無疑具有相當的異質性——而也正是這樣的異質性，成就了《文學雜誌》不同於其它藝文雜誌的特色。它爲貧瘠森嚴的文化場域引進新血，注入清流，不僅與當時的藝文界進行多方對話，樹立了以嚴肅態度討論文學的風氣，流風所及，更爲其後《現代文學》與《中外文學》的發刊，產生深遠影響。

32 劉紹銘，〈懷濟安先生〉，《吃馬鈴薯的日子》（臺北：晨鐘，1970）。
33 白先勇，〈驀然回首〉，收入《驀然回首》（臺北：爾雅，1978），頁65-7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三）教育空間與文化場域的互涉

如前所述，藝文界的自由創作者，以及學院中的教授與學生，共同構成了《文雜》的主要作者群。而當這些來自學院的教授學生，把他們的教學所得，移置到公開出版發行的文學性雜誌之後，不僅《文雜》本身，已因兼括「教育空間」與「文化場域」二者，產生自我交融匯通的特色，並且以此一特色，與當時其它的文化社群進行對話。其中，尤以對於「現代詩」及「小說」的各類論述，以及相應而生的種種創作實踐，最爲可觀。[34]

現代詩方面，關於詩之語言、格律，以及所涉及的「浪漫」、「現代」美典之爭，是爲關注重點。此一系列的討論始於《文學雜誌》一卷四期梁文星（吳興華）〈現在的新詩〉一文，他從詩之形式規律著眼，表達對臺灣新詩創作之質疑與批判，隨即引發不少回響，除了《文雜》自身持續關注外，《自由中國》與《筆匯》也相繼出現回應文章。其作者群，來自文化界者，有周棄子、覃子豪、嚴明、言曦等，學術界者，則以余光中、夏濟安爲主力。如《文雜》一卷六期，即同時有周棄子發表〈說詩贅語〉，及余光中翻譯艾略特〈論自由詩〉。前者指出，現代的詩固然應表現「現代的生活與情感」，而它必得要藉由一「固定的形式」來體現。後者則說明，所謂「自由詩」並非以沒有體裁、不押韻或沒有音步來作定義；且只有以「人爲的限制」爲背景而出現的自由，才算真正的自由。這些討論，顯然對夏濟安頗有觸發。《文雜》二卷一期，他發表〈白話文與新詩〉；隨即又在《自由中國》發表〈對於新詩的一點意見〉，主張詩人應重視白話文，並善用現代人的口語以創造新的節奏。此後，嚴明在《自由中國》發表〈試談新詩形式上的問題〉；覃子豪在《筆匯》發表〈論新詩的發展〉，余光中在《文雜》發表〈文化沙漠中多刺的仙人掌〉等，都是延續前述論題而做出的不同回應；而它的指向，正是在兼顧既有文化與語文特性的同時，追求具有「現代」特質的新詩美典。[35]

此一指向，在《文雜》看重文學理論的編輯理念，以及強烈的「學院派」特質主導下，落實爲作品實踐與理論闡析的相互生發。四卷六期，《文雜》同時刊出夏濟安仿艾略特〈荒原〉的一首詩作〈香港——一九五〇〉，以及陳世驤針對該詩而發的論述：〈關於傳統．創作．模仿——從「香港——一九五〇」一詩說起〉，正是最典型的實例。夏詩藉香港摹寫離散荒涼的現代情境，

34 《文學雜誌》3卷1期〈致讀者〉即明言：這一年來，我們曾經連續發表過幾篇討論「新詩的前途」和「中國社會和小說」的論文，這些文章相當的受人注意。

35 關於「現代詩」方面的對話往來及其意義，可參見楊宗翰〈《文學雜誌》與臺灣現代詩史〉、柯慶明〈學院的堅持與局限〉。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並且揉合「古文和舊詩裡的句子，以及北平人和上海人所說的話」，和「歐化的句法」等所可能涵具的表現潛力，在語言上進行「集古今中外於一堂」的實驗。陳文則出之以理論意識，對此進行多方解讀；最後，並且特別強調：

> 我說〈香港——一九五〇〉不稱是「奇文」，也不泛說是「好詩」，而是一首相當重要的詩。其重要性在於其為一位研究文藝批評的人（我希望讀者見過《文學雜誌》第二卷第一期夏濟安先生自己〈白話文與新詩〉一文）有特別意識的一首創作。不必個個詩人都如此有意為文……。但明顯的方法意識，在我們的這一切標準都浮游不定的時代，總覺是需要的。

以理論／方法意識去創作／解讀具體文本，既是學院教師講解示範性格的彰顯，同時也再次呼應了《文雜》一貫的編輯理念：「文學理論和有關中西文學的論著，可以激發研究的興趣；它們本身不是文學創作，但是可以誘導出更好的文學創作」。如此做法，對當時藝文界其它作者的影響如何，或未可確知；但至少，日後《現代文學》諸多青年創作者有意識地參據現代主義文學理論和大師作品以進行自我創作，以及歐陽子以新批評方法解讀《臺北人》，都可在此一示範性操作中，找到淵源。

然則，若論及夏濟安先生的文學興趣，以及《文雜》對其後文學發展的影響，畢竟是小說重於詩歌，因此，《文雜》對於「小說」及因之衍生出的社會文化論述，或許更值得注意。大體而言，這些討論包括學界對於中國社會與文學之關係的各方探討、學界與文化界因《紅樓夢》而引發的對話，以及爲了藉理論「誘導出更好的文學創作」，學者援用西方文學批評方法評論臺灣當代作家作品等。

其中，關乎中國社會與文學之關係的討論，係由二卷三期居浩然〈說愛情〉一文首開端緒，之後，夏志清針對居文而發的〈愛情・社會・小說〉，於二卷五期刊出，二卷六期，並有勞榦〈中國的社會與文學〉，都就此多所延伸發揮。而三卷一期夏濟安〈舊文化與新小說〉一文，則可視爲此一系列討論的初步總結：「我們的新小說，在這個意義上說來，必然是中西文化激蕩後的產物」。因而，除了重新認識「舊文化」，參酌儒家思想之外，他對小說家的建議是「所需要培養的，是小說藝術」；而喬治艾略特、亨利詹姆士、康拉德、珍奧斯汀、D.H.勞倫斯、托爾斯泰、和杜斯妥也夫斯基等人，正是所以取法的對象。如此，「舊文化」與「新小說」，遂不僅不再對立，反而相輔相成，成爲構成現代文學創作不可或缺的一體兩面。

此外，三卷三期刊出劉守宜以「石堂」爲筆名所撰寫的〈紅樓夢的對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話〉，則意外引發學界與文化界的另一重對話。石堂文章的重點，原在論析《紅樓夢》，但因文中以徐訏小說爲例，引申出若干討論，徐不以爲然，故隨即撰寫〈紅樓夢的藝術價值與小說裡的對白〉，於《自由中國》十八卷四期刊出。該文並引起夏志清注意，據此再撰寫〈文學．思想．智慧〉一文，予以回應。[36]

不過，由於《文雜》所關注的，主要還是中國文學——尤其是近現代的中國文學，因此特別期待這方面的論述。然而，「以一個編輯論，這一類的文章最棘手。困難第一是臺灣根本就沒有幾個夠資格的批評家。第二，臺灣沒有產生過幾本值得批評的好小說」。[37]也因此，夏濟安遂在吳魯芹建議下，親自撰寫〈評彭歌的「落月」兼論現代小說〉一文，於一卷二期刊出。該文援用西方文學批評方法，就彭歌的小說《落月》做出極其細緻深刻的評論，其重點，或許並不在「評《落月》，反而是以此爲例，以「論現代小說」爲名，提供了年輕的寫作者，符合「現代」美感的，創作的基本要領與琢磨求精的寫作方向。爲此，彭歌甚至親自致函夏濟安，表示：「自今而後數年間，《落月》或將月落無痕，然以弟意度之，大作則爲必傳之文」。[38]

也因此，夏濟安先生逝世之後，《現代文學》與《幼獅月刊》兩刊物曾先後爲他製作紀念專輯，編輯焦點不約而同地落在「小說」之上。《現文》〈紀念專輯前言〉，甚至開宗明義表示：

> 這個專輯係紀念夏濟安先生而出，裡面蒐有夏志清教授及劉紹銘先生兩篇評介，餘者為夏濟安先生小說創作及對西洋小說的評論。本輯內容偏重小說，有其特殊的意義：因為濟安先生生前對於中國文學最關心的問題，即是中國近代小說發展及其隱憂……

而文中，除多方申言濟安先生對於中國近現代小說創作及文學研究的意見外，文末並且再次強調：

> 小說一科，其說不小，裡面有最深淵的人生道理，最高度的藝術成就。世界各國首輪學府的中文系早將《紅樓夢》、《水滸》、《三

36 據該文後附編者言：本文原係夏志清先生為《自由中國》所寫，經商得「自由中國社」及作者的同意，改由本刊發表。夏文開篇即表示：此文係讀了徐訏在《自由中國》18卷4期〈紅樓夢的藝術價值與小說裡的對白〉第一部而發揮者。而徐文（連載於《自由中國》18卷4-6期）則因石堂在《文雜》3卷3期的〈紅樓夢的對話〉而起。4卷1期，石堂並有〈再論紅樓夢的對話——覆徐訏先生〉，做為回應。

37 劉紹銘，〈懷濟安先生〉，《吃馬鈴薯的日子》（臺北：晨鐘，1970）。

38 彭歌，〈夏濟安的四封信〉，《中外文學》1卷1期（1972），頁109-11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國》奉為中國文學的經典，成百成千的外國學子都孜孜不息的在研究這幾本中國文學名著，而我國大學的國文系，小說一科，尚付缺如。曹雪芹、施耐庵、羅貫中尚且徜徉臺灣大學門外，不得登堂入室。憑此一點，西洋學術界有理由譏評我國人文教育落後。本刊藉發行此專輯之際，重申夏濟安先生生前對中國小說前途之關切，並要求我國學術界對中國小說之重視。[39]

《現文》爲夏濟安在臺大外文系任教時之子弟兵白先勇、王文興等創辦，原以引介西方現代主義文學及小說創作爲主。但夏對中國小說高度重視的理念，顯然也在此得到延續。「紀念專輯」之後，《現文》連續兩期刊出夏志清〈《水滸傳》的再評價〉及〈《紅樓夢》裡的愛與憐憫〉等討論中國古典小說的論文，此後，夏志清先生英文版的《中國古典小說》，乃由《現文》逐篇譯完刊出；三十三、三十五兩期，並由臺大中文系師生合作推出「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專號」，即可視爲以具體行動，回應夏濟安的文學理念。「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專號」的研究論文，雖然不少係出自年輕研究生之手，未必盡能擲地有聲，但不否認的是，這些篇章都爲日後學院中古典文學的教學與研究，提供了重要參考。而《現文》藉出刊「紀念專輯」呼籲學界「重視中國小說」，並且身體力行，刊載學界的文學研究專號，亦未嘗不是標識著「文化場域」與「教育空間」辯證交融的發展進程：經由學院教育養成的文化工作者，進入文化場域後，返身再對學院教育提出建言，並以實際成果，反饋學院教育——而它的後續成果，亦可得見於九年後《幼獅月刊》所製作的「夏濟安先生追思特輯」：該期出版於一九七四年九月，以Franz H. Michael的〈懷念夏濟安——吾友兼同事〉爲首排，繼而選譯夏濟安〈《西遊補》：一本探討夢境的小說〉作爲發端，之後所刊各篇，皆是來自於海內外學界研析中國古典小說的論文。內容方面，從《鏡花緣》到《兒女英雄傳》；從《三國演義》到《隋唐演義》、《封神演義》和《水滸後傳》，無不包羅；撰文者則從資深學者夏志清、馮承基到年輕一輩的黃美序、董挽華等，亦同襄盛舉。[40]它以編者前言，

39 《現代文學》25期（1965），頁2-3。

40 該期要目包括：夏志清，〈文人小說家和中國文化——《鏡花緣》研究〉、侯健，〈《兒女英雄傳》試評〉、何谷里，〈《隋唐演義》：其時代、來源與構造〉、馮承基，〈《隋史遺文》涉獵記〉、黃美序，〈從我的初戀《封神演義》談起〉、董挽華，〈《聊齋志異》裡考生與考官的對立關係和科舉內幕〉、Francis A. Westbrook著，王其譯，〈論夢、聖人和魔鬼：《紅樓夢》及《白癡》中的真與幻〉、張健，〈讀《水滸後傳》——中國的烏托邦〉等。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切要地說明了該期旨歸：

> 當中國的古典小說已從說書的傳統走出而蔚為大國，讓我們今日更能注目此些奇章珍篇、吉光片羽，以求闡發中國古典小說潛德之幽光。我們籌劃此期特輯的衷願，一在斯焉。
>
> 我們謹以此期懷念夏濟安先生。[41]

《幼獅月刊》是「幼獅公司」旗下所屬的刊物之一，與當時的「青年（反共）救國團」深有淵源。自五〇年代創刊以來，編輯路線每每依違於政治、文化、學術之間，屢經轉折。七〇年代中期，它的「編輯委員」組成者雖然多爲來自學界的青年，刊物內容也以學術性論述居多，但涵蓋面廣泛，刊載者未必盡屬文學性篇章。[42]該期以「特輯」方式，全幅刊載中國古典小說的研究論文，並明言以此「懷念夏濟安先生」，堪稱以另一型式，體現了夏濟安與《文學雜誌》之所以促發「文化場域」與「教育空間」往來互動的影響及貢獻。

正是如此，我們得以據此重新省視《文學雜誌》在當代文學／文化史上的意義。

三、從《文學雜誌》到《文學雜誌》：傳統的賡續與開創

（一）《文學雜誌》——學院派文學雜誌傳統的賡續

回顧學界關於夏濟安及《文學雜誌》的相關研究，可見的是，儘管各家論者都肯定夏及《文雜》的重要性，但論及其時代意義時，多將它與五〇年代稍早的《自由中國》，及六〇年代之初的《現代文學》相聯繫——也就是往前追溯，認爲它承續了《自由中國》之於「自由主義傳統」的堅持，並認爲它是《自由中國》「文藝欄」的「純文學版」；往後延續，則以爲它啓導了《現代文學》的創刊，爲六〇年代臺灣「現代主義文學」開啓先河。這樣的論述固然言之成理，格局卻未免失之狹隘。然而，若循由前文的論述脈絡——也就是著

41 《幼獅月刊》40卷3期（1974），頁2。

42 以該期為例，其時之編輯委員包括林添貴、邱成章、周玉山、徐芳玲、馬悅麗、陳秀芳、莊伯和、梁伯傑、董挽華、熊世禮、趙綺娜、鄭彥熙多人，他們的學術背景分屬中文、外文、歷史、藝術、政治等不同方面。而該期前後，則分別有針對語言、歷史、教育等不同議題所製作的專輯。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眼於《文雜》與「臺灣大學」的淵源，以及因之而導發的「文化場域」與「教育空間」的往還互動，則對《文雜》在當代文學／文化史上之意義的省察，便也就開拓出不同的觀照視野。

現代大學在中國的興起與建制，是近代教育文化史上劃時代的盛事。無論是知識生產，文化啓蒙，抑是文學傳播，大學的作用，無不舉足輕重。以五四時期新文化／文學運動的推展爲例，北京大學師生群的貢獻，即屬有目共睹；而他們的努力，很大部分即是透過期刊雜誌而廣爲傳播。從《新青年》、《新潮》，到《語絲》、《駱駝草》，各刊物的訴求與關懷重點容或不同，但以北大師生爲主體撰作群的做法，則是不約而同。這一批來自學院的現代知識分子，頻頻藉由出版報刊而引領思潮，推介新知，同時身體力行，開展種種文學實驗，不僅引人矚目，成果斐然，[43]而且也爲現代文學／文化史上「文學場域」與「教育空間」的往來互涉開啓風氣，提供示範。

作爲戰後臺灣首屈一指的指標性大學，「臺灣大學」的地位與五四時期的北京大學原就差堪比擬；再者，傅斯年校長與北大淵源深厚，臺大早年文科主要師資多來自於北大，加上不少課程設計之標準與排列，都是「參考北大清華者定之」。[44]凡此，可見兩校實質上的相類相通之處，也所在多有。《文學雜誌》是爲戰後臺灣第一份以臺大師生爲主要撰作者的文學性雜誌，論者或因此將它與新文化運動時期的《新青年》相提並論——誠然，就其與學院的關係，以及能夠在政治文化風雲動盪之際開啓一代風氣等方面，二者或有相類之處；然而細究二者的文化思想理念，卻頗多出入。[45]事實上，追本溯源，夏濟安等人創辦《文學雜誌》之初，真正所欲取法的對象，本非《新青年》，而是由朱光潛、廢名等人所創辦的另一同名刊物《文學雜誌》。吳魯芹即曾明言：

> 似乎雜誌的名稱一開始就定了，沒有討論過，我們都覺得抗戰以前朱孟實（光潛）先生主編的《文學雜誌》和我們的構想最接近，也是最值得賡續的傳統。……

43 陳平原，〈新教育與新文學〉，收入《中國大學十講》（上海：復旦大學，2002），頁101-133；陳平原，〈一份雜誌：文學史／思想史視野中的《新青年》〉，《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臺北：二魚文化，2003），頁61-143；高恒文，《京派文人：學院派的風采》（上海：上海教育，2000）。

44 《國立臺灣大學校刊》第3期（1947）。

45 《新青年》等刊物主張西化，提倡「新文化」，基本上是近乎全面的否定了中國文學的大傳統。《文學雜誌》則「希望是要繼承數千年來中國文學偉大的傳統，從而發揚光大之」。參見柯慶明，〈學院的堅持與限一〉。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文學雜誌》的編排以及外表，多少是承襲當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文學雜誌》。守宜不知從那裡找到一本舊本作範本。大體上是一仍舊貫，並不需要什麼新意。[46]

朱光潛主編的《文學雜誌》是一份綜合性文藝月刊，一九三七年五月創刊於北京，由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四期之後，便因抗戰停刊；一九四七年復刊，至一九四八年十一月終刊，共出三卷，凡二十二期。創刊之初，時當左翼／革命之論甚囂塵上、各類思想鬥爭如火如荼，《文學雜誌》則堅持自由生發的文化路線，強調「在衝突鬥爭之中，我們還應維持『公平交易』與『君子風度』」，反對「用低下手腕或憑仗暴力箝制旁人思想言論的自由」。由朱光潛執筆的發刊詞〈我對於本刊的希望〉，特別聲明：

> 我們對於文化思想運動的基本態度，用八個字賅括起來，就是「自由生發，自由討論」。我們相信文化思想方面的深廣堅實的基礎是新文藝發展所必需的條件。……
>
> 我們主張多探險、多嘗試，不希望某一種特殊趣味或風格成為「正統」，這是我們的新文藝的試驗時期。……
>
> 根據這種信念，一種寬大自由而嚴肅的文藝刊物對於現代中國新文藝運動應該負有什麼樣使命呢？它應該認清時代的弊病和需要，盡一部分糾正和嚮導的責任；它應該集合全國作家作分途探險的工作，使人人在自由發展個性之中，仍意識到彼此都望著開發新文藝一個共同目標；……它應該是新風氣的傳播者，在讀者群眾中養成愛好純正文藝的趣味與熱誠，它不僅是一種選本，不僅是回顧的而同時是向前望的，應該維持長久生命，與時代同生展；它也不僅是一種「文藝情報」，應該在陳腐枯燥的經院習氣與油滑膚淺的新聞習氣之中，闢一清新而嚴肅的境界，替經院派與新聞派作一種健康的調劑。[47]

檢視此一《文學雜誌》，編輯群除朱光潛外，還包括周作人、葉公超、沈從文、楊振聲、朱自清、廢名、林徽音等人，顯然是一份以北大教授爲主要撰作群的文學性雜誌，同時被論者視爲「一個典型的『京派』的雜誌，並且是集合了『京派』集體力量的第一個雜誌」。[48]此外，卞之琳、何其芳、李廣田等

46 吳魯芹，〈瑣憶《文學雜誌》的創刊和夭折〉。

47 《文學雜誌》1卷1期（1937），（頁碼）。

48 高恒文，《京派文人：學院派的風采》（上海：上海教育，2000），頁199。而余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年輕一輩的北大畢業生，也同時在此發表作品，其與北京大學的淵源，由此可見。不過，夏濟安、吳魯芹以之爲師法對象，起初所著眼者，未必是它以大學學院人力爲主要作者群的做法，而是它在各種意識型態鬥爭激烈的大環境中，仍力圖「開發新文藝」，堅持作爲一份「寬大自由而嚴肅的文藝刊物」，以及期待「在讀者群眾中養成愛好純正文藝的趣味與熱誠」。[49]然而不容否認的是，畢竟是由於一批來自臺灣大學的學院撰作群，以及試圖「以理論激發創作」的編輯理念，才使得這份出自於夏濟安之手的《文學雜誌》，在有意賡續朱光潛所編《文學雜誌》之傳統的同時，產生了不同的轉折與開創。

參較兩份同名的《文學雜誌》，明顯可見的相同點是：所刊文稿皆以各類文學創作與評論爲主，而且夏編《文雜》每期必以文學評論爲首排的做法，更是明顯承襲自朱編。[50]但在這之外，朱編堅持不收翻譯作品，[51]夏編則不僅一開始便說明在稿件徵用上，歡迎「各種體裁的文學創作與翻譯，希望海內外作家譯家，源源賜寄，共觀厥成」；而且還特別表示：「文學理論和有關中西文學的論著，可以激發研究的興趣；它們本身不是文學創作，但是可以誘導出更好的文學創作。這一類的稿件，我們特別歡迎」。這一點，不僅是二者最大不同處，更是夏編《文雜》得以別出於朱編，在戰後臺灣文化／文學史產生重大影響的關鍵。

基本上，撰述中西文學論著與從事翻譯工作，需要一定的學養與訓練，這原爲學院派作者所專擅。尤其「京派」學者，多爲精通中外文學理論的專家及

光中也以《文雜》的學院作者陣容強大，認為它十分「京派」。見〈夏濟安的背影〉，《文訊》第226期（2003），頁111-113。

49 夏編《文學雜誌》創刊號〈致讀者〉一開始即表明：「我們希望：讀者讀完本期本刊之後，能夠認為這本雜誌還稱得上是一本『文學雜誌』」。「我們希望：因《文學雜誌》的創刊，更能鼓舞起海內外自由中國人士寫讀的興趣」。

50 朱編《文雜》的一大特點，就是每期必以二至四篇評論文章，作為雜誌的開卷之作，這是新文學動運以來其它刊物所不曾有過的做法。這些篇章的作者包括朱光潛、周作人、錢鍾書、郭紹虞、朱自清、朱東潤、馮至、聞一多、李長之等人，內容則多為關乎討論中國文學的學術性文字。如創刊號葉公超〈談新詩〉一文，討論新詩與中國古典詩歌的藝術繼承問題，即是當時十分重要的詩論。夏濟安主編《文學雜誌》時，很明顯地也採取了同樣的做法。有關朱編《文雜》各期首排論著作者篇目資料，請參見附錄四。

51 朱編《文雜》在第一次編委會上，即決定雜誌編輯的三大原則：一、除創作外要有論文；二、每期要有幾篇書評；三、不要翻譯作品。參見常風，〈回憶朱光潛先生〉，收入《逝水集》（遼寧：遼寧教育，1995），頁8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翻譯高手，他們不此之圖，很大一部分原因，乃是緣於三〇年代上海特殊的時代環境，以及因之而生的文化政治立場。[52]時空遷易，五〇年代的臺灣，政治文化環境固不同於三〇年代的上海；在一切以「反共」爲前提的國家文藝政策主導下，臺灣的文化界荒蕪貧瘠，對於國外藝文新知新作的渴求，反而因此特別殷切。夏濟安、吳魯芹等人，原就在臺大外文系開授翻譯及西洋文學課程，因授課之便，將大學講堂內容轉化爲文化出版品，恰恰符應了當時眾多純藝文愛好者的實際需要。[53]《文雜》的翻譯兼括文藝創作與文學理論，並且試圖援用所引介的西方文學理論來評論時人作品，以求提昇創作品質（如夏濟安之評彭歌《落月》），此一路徑，既是朱編《文學雜誌》之傳統的折變，也是戰後臺灣「學院派」文學雜誌之新傳統的開創。

（二）《文學雜誌》與臺灣學院派雜誌傳統的開創

《文學雜誌》對戰後臺灣「學院派」文學雜誌之新傳統的開創之功，具體呈現在六〇年代《現代文學》及七〇年代《中外文學》的相繼刊行，並持續對臺灣文學發展及大學教育產生重大影響之上。《現代文學》於一九六〇年三月創刊，創辦者白先勇、王文興、陳若曦等人，當時都還是臺大外文系三年級的學生。他們受教於夏濟安先生，《現文》創刊前，大都已在《文雜》初試啼聲，發表小說創作。《現文》創刊後，他們不僅藉此持續進行各自的小說寫作實驗，終至卓然成家；並且大力譯介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理論及名家作品，以爲攻錯之資。此外，此一公開園地同時也吸引了王禎和、施叔青、李昂等有志於文藝寫作的青年投入創作，共同締造六〇年代「現代主義文學」的輝煌時代，其於戰後臺灣文學發展的貢獻，早已得到論者多方肯定。

《現文》繼《文雜》之後，成爲六〇年代臺灣最重要，也最具代表性的文學性雜誌，《文雜》的啓廸和臺灣大學文學教育的導發之功，實不可沒——這不僅是因爲夏濟安主編《文雜》，對於這批才情洋溢的文學青年多所栽培，使他們日後得以風格各異的小說創作，在臺灣文學界大放異彩；更因爲臺大的自由校風、文學院的課程教學，以及《文雜》的譯介示範，使他們累積了可據以自行選擇譯介歐美作家作品的胸襟、眼光與能力。白先勇〈《現代文學》創立

52 京派的學者文人對於當時左翼文人挾外來的階級理論以自重，卻又寫不出好作品的情形深為不滿，朱編《文學雜誌》因此不收翻譯，不談理論。參見高恒文，《京派文人：學院派的風采》（上海：上海教育，2000），頁195-215。

53 由白先勇乍讀《文雜》王鎮國譯華頓夫人《伊丹傳羅姆》時的驚喜之情，即可見一斑。見〈驀然回首〉。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時代背景及其精神風貌〉一文，即曾清楚指出臺灣大學、夏濟安與《文學雜誌》和《現代文學》的關係：

> 那時我們都是臺灣大學的學生，雖然傅斯年校長已經不在了，可是傅校長卻把從前北京大學的自由風氣帶到了臺大。……臺大外文系當年無為而治，我們乃有足夠的時間去從事文學活動。我們有幸，遇到夏濟安先生這樣一位學養精深的文學導師，他給我們文學創作上的引導，奠定了我們日後寫作的基本路線。他主編的《文學雜誌》其實是《現代文學》的先驅。[54]

具體言之，《現文》所以有諸多關乎「現代主義」文學大家的譯介，無非是出於夏濟安及《文學雜誌》的啓導。以創刊號製作「卡夫卡專號」爲例，這是臺灣對於卡夫卡其人其文的譯介之始。然而，當時臺灣文化界荒蕪寂寞，對歐美藝文訊息所知有限，卡夫卡更是從未爲人聞問。《現文》諸子，究竟是如何「發現」了卡夫卡？可見的是，首先，《文雜》四卷二期曾刊出夏濟安以「齊文瑜」筆名，翻譯了Philip Rahv原著的〈論自然主義小說之沒落〉一文，譯者文後並且註言：「該文作者爲美國當代批評家，*Partisan Review*創辦人兼主編」。再者，夏濟安並在課堂上大力推介Philip Rahv及「現代圖書館」叢書，而「現代圖書館」，正所以成爲《現文》譯介現代主義文學時，最重要的參考來源。[55]

正是以理論配合創作實驗，且又能在創作方面卓然有成，《現文》非但在創作方面的成績明顯超越《文雜》，即就臺灣「學院派」雜誌傳統的開創與承續而言，《現文》重視西方作品及理論譯介的做法，亦是將夏濟安針對朱光潛所編《文雜》所做出的創變處，予以發揚光大，對臺灣文壇帶來重大啓發。白先勇曾肯定地表示：

> 我肯定的認為《現代文學》在六〇年代，對於中國文壇，是有其不可抹滅的貢獻的。
>
> 首先，是西方文學的介紹。因為我們本身學識有限，只能作譯介工作，但是這項粗淺的入門介紹，對於臺灣文壇，非常重要，有啟發

54 白先勇，〈《現代文學》創立的時代背景及其精神風貌〉，收入《現文因緣》（臺北：現文，1991），頁8-9。

55 李歐梵著，林秀玲譯，〈在臺灣發現卡夫卡：一段個人回憶〉，《中外文學》第30卷6期，200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作用。因為那時西洋現代文學在臺灣相當陌生，像卡夫卡、喬埃斯、湯瑪斯曼、福克納等這些西方文豪的譯作，都絕無僅有。喬埃斯的長篇小說經典之作《都柏林人》我們全本都譯了出來。後來風起雲湧，各出版社及報章雜誌都翻譯了這些鉅匠的作品，但開始啟發讀者對西洋現代文學興趣的，《現文》實是創始者之一。……[56]

再者，將學院師生的教學成果轉化爲文化出版品，讓教育空間位移至文化場域，進而再度帶動學院與文化界的交融互動，乃是《現文》對《文雜》之學院傳統的另一項承繼與發揚——箇中關鍵人物，是爲學成歸國，回到臺大任教的王文興；而它的具體效應，則是使原先以外文系師生爲主要編撰群、側重西洋現代文學與理論的路線出現轉折，重新回到中、外文系攜手合作，同時兼重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方向。

一九六五年，畢業後進入愛荷華大學小說創作班就讀的王文興獲得藝術碩士學位，返回臺大任教，同時擔任外文系與中文系的合聘教授，以及《現文》主編。如同當年夏濟安同時身兼《文雜》主編及外文系教師，王文興在《現文》主編任內爲臺大中文系開課，同樣是在善用臺灣大學的師生資源下，讓原本局限於學院內的師生教學成果，推移至學院之外，形成「教育空間」與「文化場域」的對話交融。[57]饒有興味的是，夏濟安之主編《文雜》，編輯理念原是希望能「繼承數千年來中國文學偉大的傳統，從而發揚光大之」；但所培育出的外文系子弟兵，卻因西洋文學的專業訓練使然，讓《現文》在致力文學創作外，一開始的發展重點，便完全落在西洋文學及理論譯介之上。然而，隨著原初創辦人白先勇等紛紛畢業出國，王文興返校爲中文系開課，則又因援引中文系學生共同參與，使《現文》編輯路線轉向，重新回到兼重中國文學論述的方向。此一轉折，固然不無財務、人力配合等其它因素的考量，[58]但一份文學性雜誌精神風貌的形塑，如何受到大學專業教育影響的情形，卻是由此可見。

正是經由此一轉折，《中外文學》的創刊，遂也有其內在脈絡可循。《中外》創刊於一九七二年六月，時當臺大成立比較文學研究所，並舉辦比較文學會議，中、外文系之間，乃多有合作機會。而當時的文學院長朱立民、外文系主任顏元叔，以及外文系教授胡耀恆、中文系教授葉慶炳之間，更因公務私誼

56 白先勇，〈《現代文學》的回顧與前瞻〉，《現文因緣》（臺北：現文，1991），頁201。

57 柯慶明，〈短暫的青春！永遠的文學？〉，《現文因緣》（臺北：現文，1991），頁37。

58 《現文》的創刊及精神風貌的變化，詳見白先勇，〈《現代文學》創立的時代背景及其精神風貌〉，《現文因緣》（臺北：現文，1991），頁7-1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之便，時相往還。某次聚會之後，朱、顏、胡三人決定創辦一份文學雜誌，遂以朱立民爲發行人，顏元叔任社長，胡耀恆任總編輯，而葉慶炳教授，則是溝通聯繫中、外文系之間的主要橋樑。[59]

基本上，《中外》結合臺大中、外文系的師資人力共同經營組稿，原已是再現了當年夏濟安主編《文雜》時的規模；再則，《中外》的發行人朱立民本是《文雜》後期主要的撰作者之一，雜誌經理則是當年《文雜》三位創辦者之一的劉守宜，如此組合，與《文學雜誌》之間的淵源，也顯然可見。此外，細察《中外》創刊號，它與《文雜》的淵源，至少還可由以下三點見之：

一、〈發刊詞〉提出三項工作重點：1.文學創作；2.學術論著；3.翻譯介紹國外的文學作品。事實上，這三項正是當年《文雜》所一貫關注的項目。

二、以臺靜農先生的中國文學史論述爲首排，次以顏元叔的現代中國新詩評論與李達三的比較文學論述，此一看重文學研究與評論的做法，仍是從朱編《文雜》到夏編《文雜》的一脈相承。

三、特別選刊彭歌〈夏濟安的四封信〉，並在〈編後記〉強調：

> 《文學雜誌》是現代中國文學刊物上極為重要的里程碑，它的主編對中國文學的希望和編雜誌時所遭遇到的困難，在「夏濟安先生的四封信」中充分地顯示出來。這將是中國文學史上一份珍貴的材料。[60]

凡此，皆可見出夏濟安及其所編《文雜》的精神與理念，是如何薪火相傳，直至《中外》而源源不絕。

《中外》創刊迄今，已逾三十餘年，創作方面的成績或許有限，但於譯介西方文學／文化理論、帶動研究風潮方面的貢獻，卻早爲各界公認。尤其近十數年來，從後現代到後殖民，從女性主義到同志理論，由臺大外文系所主導的《中外》莫不引領風騷，早發先聲。它集合師生力量，以專輯形式，從事各種重要歐西理論的引介，其效應，每每是社會文化與學院教育的頻頻追步。縱橫於「教育空間」與「文化場域」之間，它的傳承轉折仍在持續發展之中，實有

59 〈《文學雜誌》、《現代文學》、《中外文學》——對臺灣文學深具影響的文學雜誌〉，座談會上朱立民的發言。有趣的是，《文學雜誌》的創辦，肇因於夏濟安、吳魯芹、劉守宜三人麻將桌上的往來（見吳魯芹，〈瑣憶《文學雜誌》的創刊和夭折〉）；據朱立民座談所言，《中外文學》則是朱立民、顏元叔、胡耀恆三人在一起打了一夜撲克牌之後的決議。

60 《中外文學》1卷1期（1972），頁19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待來日另文專論。而回到夏濟安、《文學雜誌》與臺灣大學的主題，本文最後要再次強調的是：

從《文學雜誌》到《現代文學》，以迄於《中外文學》，所標識出的，正是臺灣學院派雜誌新傳統的開創與傳承——在對「文學」的堅持、善用學院人才資源以充實篇幅、提昇雜誌內容，以及重視中國文學研究等方面，夏濟安的《文學雜誌》誠然是賡續了先前朱光潛《文學雜誌》的傳統；但是，夏編《文雜》高度重視西方文學作品及理論翻譯的做法，卻使它爲臺灣建樹了一個與過去迥然有別的新傳統。這個新傳統，不只是學院資源由臺灣大學取代了過去的北京大學，也不只是創作上由「京派」品味轉向體現臺灣自身的文學風貌；更重要的是，長久以來，它充份運用了學院中的師生資源，藉由譯介國外最新進的文學作品及理論以激發優秀創作，深化中、外文學界的學術研究，凡此種種，皆爲學術界與文化界激盪出無比的潛力與活力，並無形中左右了戰後臺灣文學與文化的發展走向——而這一點，也正是夏濟安、《文學雜誌》和臺灣大學，在戰後臺灣文學與文化史上共同締造的重大意義。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引用書目

《文學雜誌》（朱光潛編）

《文學雜誌》（夏濟安編）

《中外文學》

《幼獅月刊》

《現代文學》

《公論報》

《臺灣大學校刊》

臺大課務組課程表（民國37-50學年度）

《國立臺灣大學校史稿：（1928-2004）》，臺北：臺灣大學，2005。

尹雪曼，《中華民國文藝史》，臺北：正中書局，1975。

白先勇，〈驀然回首〉，收入白先勇《驀然回首》，臺北：爾雅，1978。

白先勇，〈《現代文學》創立的時代背景及其精神風貌〉，收入《現文因緣》臺北：現文，1991。

白先勇，〈《現代文學》的回顧與前瞻〉，收入《現文因緣》，臺北：現文，1991。

朱雙一，〈《自由中國》與臺灣自由人文主義文學脈流〉，收入何寄澎主編，《文化・認同・社會變遷：戰後五十年臺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文建會，2000。

余光中，〈夏濟安的背影〉，《文訊》第226期，2003。

李歐梵著，林秀玲譯，〈在臺灣發現卡夫卡：一段個人回憶〉，《中外文學》第30卷6期，2001。

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的高等教育〉，《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第25期，1993。

吳魯芹，〈瑣憶《文學雜誌》的創刊和夭折〉，《傳記文學》第30卷6期，1977。

林海音，〈小說家應有廣大的同情——悼念夏濟安先生〉，收入夏濟安先生紀念集編印委員會編，《永久的懷念》。臺北：濟安先生紀念集編印委員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會，1967。

柯慶明，〈短暫的青春！永遠的文學？〉，收入《現文因緣》。臺北：現文，1991。

柯慶明，〈學院的堅持與局限——試論與臺大文學院相關的三個文學雜誌〉，「文學傳媒與文化視界」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2003年11月8-9日。

侯健，〈紀念夏濟安先生〉，收入夏濟安先生紀念集編印委員會編，《永久的懷念》。臺北：濟安先生紀念集編印委員會，1967。

徐筱薇，《臺灣現代主義思潮之出發——以《自由中國》、《文學雜誌》爲分析場域》。臺南：成功大學臺文所碩士論文，2004。

高恒文，《京派文人：學院派的風采》，上海：上海教育，2000。

常風，〈回憶朱光潛先生〉，收入《逝水集》，遼寧：遼寧教育，1995。

許俊雅〈回首話當年──論夏濟安與《文學雜誌》〉（上）、（下），《華文文學》，2002、2003。

陳平原，〈新教育與新文學〉，收入陳平原，《中國大學十講》，上海：復旦大學，2002。

陳平原，〈一份雜誌：文學史／思想史視野中的《新青年》〉，收入陳平原，《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臺北：二魚文化，2003。

陳芳明，〈臺灣現代文學與五〇年代自由主義傳統的關係以——《文學雜誌》爲中心〉，收入陳芳明，《後殖民臺灣》，臺北：麥田，2002。

陳芳明《臺灣新文學史第十三章：橫的移植與現代主義之濫觴》，《聯合文學》202期，年份。

郭強生、林慧娥整理，〈《文學雜誌》、《現代文學》、《中外文學》——對臺灣文學深具影響的文學雜誌〉，《中央日報・副刊》，1988年11月17日。

彭歌，〈夏濟安的四封信〉，《中外文學》1卷1期，1972。

褚昱志，〈五〇年代的《文學雜誌》與夏濟安〉，《臺灣文學觀察雜誌》第4期，1991。

楊宗翰，〈《文學雜誌》與臺灣現代詩史〉，《臺灣文學學報》第2期，2001。

賈廷詩，〈憶夏濟安師〉，收入夏濟安先生紀念集編印委員會編，《永久的懷念》。臺北：濟安先生紀念集編印委員會，196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歐素瑛，《傳承與創新：戰後初期的臺灣大學（1945-1950）》，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博士論文，2004。

葉石濤，《臺灣文學史綱》。高雄：文學界雜誌社，1987。

劉紹銘，〈懷濟安先生〉，收入劉紹銘，《吃馬鈴薯的日子》。臺北：晨鐘，1970。

應鳳凰，〈劉守宜與「明華書局」、《文學雜誌》〉（上）、（下），《文訊月刊》20期、21期，1985。

聶華苓〈爐邊漫談〉，收入柏楊編，《對話戰場》，臺北：林白，199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附錄一

夏濟安生平大事記

時間	事　　件
1916 年	・8 月 12 日生於江蘇省吳縣。初中一、二年級就讀於出生地聖公會創辦的桃塢中學，其後曾轉讀上海立達學園及上海中學。
1934 年	・蘇州高中畢業。考入南京中央大學哲學系肄業二年，又因肺病休學一年。
1937 年	・與母親以及弟弟夏志清遷居上海。 ・考入上海光華大學英文系。
1940 年	・6 月畢業於上海光華大學英文系。 ・秋季開始於母校光華大學擔任英文系助教、講師。
1942 年	・冬季卸去光華大學英文系職務。
1943 年	・11 月離開上海前往西安王曲，擔任中央軍校第七分校中校語文教官，教授英文。
1944 年	・夏天卸去中央軍校教學職務。 ・6 至 10 月居於重慶。於秋時前往雲南，擔任呈貢國立東方語文專科學校英文講師至翌年夏卸職。
1945 年	・秋迄翌年五月，轉任昆明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外語系教員。於西南聯大時，與光華大學老同事錢學熙及詩人卞之琳交稱莫逆外，亦曾愛上一位長沙籍的歷史系新生。
1946 年	・10 月迄 1948 年 12 月擔任國立北京大學外語系講師，期間曾與弟弟夏志清同事一年。
1948 年	・自北大卸職，回到上海。
1949 年	・於上海陷共前夕逃往香港。於香港滯居一年半之久，除經商之外，並曾短期任教於新創辦的新亞書院，也因此結識錢穆、唐君毅二位先生。
1950 年	・10 月，夏濟安由港赴台，開始任教於國立台灣大學外文系。 ・開授共同英文課程。
1951 年	・開授共同英文（第三組文法課程）、小說選讀甲、翻譯。
1952 年	・開授小說選讀 A 組、翻譯 A、B 兩組。 ・6 月，《今日世界》，第 7 期刊出小說〈蘇麻子的膏藥〉（筆名樂季生）。 ・8 月，香港中一出版社出版《莫斯科的寒夜》（*A Room on the Route*），澳洲 Geoffrey Blunden（白倫敦）著，夏濟安譯。 ・9 月，《自由中國》7 卷 5 期刊出小說〈火〉（筆名樂季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1 月香港友聯出版社出版《坦白集》（*The God That Failed*），紀德・西隆涅等六人著，齊文瑜（夏濟安筆名）譯。
1953 年	・開設小說選讀 A 組、翻譯 A、B 兩組。 ・11 月香港友聯出版社出版《草》(*The Burned Bramble*)。奧國 Man'e Sperber 著，齊文瑜譯。
1955 年	・一月香港友聯出版社出版《淵》（*The God That Abyss*）。奧國 Man'e Sperber 著，齊文瑜譯。 ・春季在台北美國新聞處安排下，前往美國印第安那大學研究院深造，專攻小說習作，於夏季返台。 ・秋，開授小說選讀 B、C、英國文學史。 ・「中央副刊」於 5 月 10、11、12 日刊載〈耶穌會教士的故事〉
1956 年	・9 月，主編《文學雜誌》在台北創刊。 ・推薦甫退役的余光中接下原本於東吳大學兼任教職。 ・開授小說選讀 A、B、英國文學史。 ・《文學雜誌》10 月號刊載〈評彭歌的「落月」兼論現代小說〉
1957 年	・開授英國文學史 A、B。 ・《文學雜誌》3 月號刊載〈白話文與新詩〉 ・《自由中國》5 月刊載〈對於新詩的一點意見〉 ・《文學雜誌》9 月號刊載〈舊文化與新小說〉 ・《文學雜誌》11 月號刊載〈兩首壞詩〉 ・台北文學雜誌社出版《匈牙利作家看匈牙利革命》。梁實秋、夏濟安等編譯。
1958 年	・《文學雜誌》四月號刊載〈論自然主義小說之沒落〉（筆名齊文瑜） ・《文學雜誌》八月號刊載〈香港——一九五〇〉 ・11 月台北文學雜誌社出版《短篇小說選》（四冊）。夏濟安編選。 ・1958-1959 年間，爲趙麗蓮的《學生英語文摘》撰寫「英語欣賞」，選評英美散文名篇。 ・開始有系統地閱讀中國舊小說。
1959 年	・《文學雜誌》1 月號刊載〈一則故事，兩種寫法〉。 ・3 月，以美國洛氏基金會資助再度赴美。先於西雅圖華盛頓大學任客座副教授一年。繼在柏克萊加州大學任教，並任中國問題研究中心客座講員、副語言研究員。 ・4 月台北文學雜誌社出版《小說與文化》。夏濟安、夏志清等著，齊文瑜編。
1960 年	・8 月《文學雜誌》停刊，共出版四十八期。 ・8 月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出版《現代英文選評注》，夏濟安編選。
1961 年	・加州大學中國問題研究中心出版《隱喻、神話、儀式和人民公社》。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963 年	・加州大學中國問題研究中心出版《下放運動》。
1964 年	・《亞洲學會季刊》2 月號刊載〈魯迅作品的黑暗面〉。 ・3 月下旬，美國亞洲學會在華府開會，吳魯芹介紹他與喬志高見面，喬並帶夏氏兄弟去見張愛玲。
1965 年	・2 月 23 日，不幸因腦溢血不治辭世，享年五十。 ・7 月，《現代文學》製作「夏濟安先生紀念專輯」，收錄文章包括：〈懷濟安先生〉（劉紹銘）、〈夏濟安對中國俗文學的看法〉（夏志清）、〈評艾思本遺稿〉（夏濟安著，莊信正譯）、〈論夏德〉（夏濟安著，柯麗美譯）、〈論狄達勒斯〉（夏濟安著，江森譯）、〈維農陀〉（夏濟安著，陳若曦譯）、〈傳宗接代〉（夏濟安作，白先勇譯）、〈耶穌會教士的故事〉（夏濟安作，侯健譯）、〈火〉（夏濟安）、〈蘇麻子的膏藥〉（夏濟安）。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附錄二：

《文學雜誌》各期首排論著作者篇目表

卷期	年月	作者	篇名	備註
1:1	1956.9	勞榦	〈李商隱燕台詩評述〉	作者爲台大歷史系教授
1:2	1956.10	梁實秋	〈文學的境界〉	作者爲台大外文系兼任教授、師大英語系教授
1:3	1956.11	Robert Penn Warren 作，張愛玲譯	〈海明威論〉	譯者爲小說家
1:4	1956.12	白簡（臺靜農）	〈魏晉文學思想的述論〉	作者爲台大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
1:5	1957.1	梁實秋	〈「亨利四世上篇」序〉	作者爲台大外文系兼任教授、師大英語系教授
1:6	1957.2	周棄子	〈說詩贅語〉	作者爲詩人
2:1	1957.3	夏濟安	〈白話文與新詩〉	作者爲台大外文系教授
2:2	1957.4	鄭騫	〈從元曲四弊說到張養浩的雲莊樂府〉	作者爲台大中文系教授
2:3	1957.5	J.E. Spingarn 著，吳魯芹譯	〈新批評〉	譯者爲台大外文系兼任教授
2:4	1957.6	夏志清	〈張愛玲的短篇小說〉	作者爲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教授
2:5	1957.7	夏志清	〈愛情・社會・小說〉	作者爲美國紐約州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立大學教授
2:6	1957.8	夏志清	〈評秧歌〉	作者爲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教授
3:1	1957.9	廖蔚卿	〈論古詩十九首的藝術技巧〉	作者爲台大中文系教授
3:2	1957.10	Irving Babbitt 著，梁實秋譯	〈浪漫的道德之現實面〉	譯者爲台大外文系兼任教授、師大英語系教授
3:3	1957.11	張沅長	〈文學史上的浪漫時期〉	作者爲台大外文系教授
3:4	1957.12	沈剛伯	〈中國文學的沒落〉	作者爲台大歷史系教授兼文學院長
3:5	1958.1	林以亮	〈密萊的生平與作品〉	
3:6	1958.2	許世瑛	〈從儒林外史談起〉	作者爲台大中文系教授
4:1	1958.3	鄭騫	〈溫庭筠韋莊與詞的創始〉	作者爲台大中文系教授
4:2	1958.4	Philip Rahv 著，齊文瑜（夏濟安）譯	〈論自然主義小說之沒落〉	譯者爲台大外文系教授
4:3	1958.5	余光中	〈愛倫坡的生平與作品〉	作者爲詩人，東吳大學兼任教師
4:4	1958.6	陳世驤	〈中國詩之分析與鑒賞示例—1958 年 6 月 7 日在台大文學院第三次演講詞〉	作者爲美國柏萊大學東亞系教授
4:5	1958.7	Henry James 著，侯健譯	〈小說的構築〉	譯者爲台大外文系教師
4:6	1958.8	陳世驤	〈關於傳統・創作・模仿—從「香港一一九五	作者爲美國柏萊大學東亞系教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〇」一詩說起〉	
5:1	1958.9	林文月	〈論陶淵明與謝靈運之爲人及其詩〉	作者爲台大中文系教師
5:2	1958.10	趙雅博	〈美的哲學觀念〉	作者爲政大哲學系教授
5:3	1958.11	Boris Pasternak 著，梁實秋譯	〈關於莎士比亞之翻譯〉	譯者爲台大外文系兼任教授、師大英語系教授
5:4	1958.12	吳魯芹	〈小說的前途〉	作者爲台大外文系兼任教授
5:5	1959.1	夏濟安	〈一則故事・兩種寫法〉	作者爲台大外文系教授
5:6	1959.2	勞榦	〈「李商隱評論」所引起的問題〉	作者爲台大歷史系教授
6:1	1959.3	彭歌	〈文學第幾?〉	作者爲作家
6:2	1959.4	陳世驤	〈中國詩歌中的自然〉	作者爲美國柏克萊大學東亞系教授
6:3	1959.5	英千里	〈漫談翻譯〉(上)	作者爲台大外文系教授兼系主任
6:4	1959.6	英千里	〈漫談翻譯〉(下)	作者爲台大外文系教授兼系主任
6:5	1959.7	William York Tindall 著，朱南度譯	〈現代英國小說與意識流〉	譯者爲台大外文系助教
6:6	1959.8	Rod W. Horton 與 Herbert W. Edwards 著，景新漢譯	〈自然主義與美國文學〉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7:1	1959.9	Malcolm Cowley 著，劉紹銘譯	〈論批評家影響下的美國現代小說〉	譯者台大外文系畢業，當時在美攻讀博士學位
7:2	1959.10	Donald Malcolm 著，劉易水譯	〈預言家與詩人—論查泰萊夫人的情人〉	
7:3	1959.11	Peter Kléne 著，葉維廉譯	〈艾略特戲劇的精神中心〉	譯者台大外文系畢業，當時在美攻讀博士學位
7:4	1959.12	趙岡	〈論紅樓夢後四十回的著者〉	
7:5	1960.1	鄭騫	〈陶淵明與田園詩人〉	作者爲台大中文系教授
7:6	1960.2	黃瓊玖	〈索福克麗的悲劇藝術〉	作者爲台大外文系教授
8:1	1960.3	Clinton S. Burhans 著，余光中譯	〈「老人和大海」：海明威對人類的悲劇觀〉	作者爲詩人，東吳大學兼任教師
8:2	1960.4	高格（Jacoborg）	〈卡繆的「荒謬論」〉	作者爲華盛頓大學與台灣大學交換教授，當時在台大外文系任教
8:3	1960.5	Lewis Munford 著，健人（侯健）譯	〈墾荒的浪漫主義〉	譯者爲台大外文系教師
8:4	1960.6	勞榦	〈論神韻說與境界說〉	作者爲台大歷史系教授
8:5	1960.7	朱立民	〈英國殖民時期的美國文學〉上	作者爲台大外文系教授
8:6	1960.8	朱立民	〈英國殖民時期的美國文學〉下	作者爲台大外文系教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附錄三：

五〇年代夏濟安、吳魯芹臺大授課表

A、夏濟安授課表

時間	開課內容	必選修	全／半	學分	年級	附註
民 39（1950）	共同英文兩班（第五組、第二十六組）	必	全	4	1	下學期同
民 40（1951）	共同英文 第三組 文法課程	必	全	4	1	
	小說選讀 甲	必	全	3	2	僅接下學期課程，上學期由任泰授課
	翻譯	選	全	2	3、4	
民 41（1952）	小說選讀 A	必	全	3	2	
	翻譯 A、B	選	全	2	3、4	
民 42（1953）	小說選讀 A	必	全	3	2	
	翻譯 A、B	選	全	2	3、4	
民 44（1955）	小說選讀 B、C	必	全	3	2	
	英國文學史	必	全	3	2	
民 45（1956）	小說選讀 A、B	必	全	3	2	
	英國文學史	必	全	3	2	
民 46（1957）	英國文學史 A、B	必	全	3	2	

※ 未見四十三學年度上學期資料，根據下學期課表夏濟安未開課。

※ 四十七學年度原有註明開「維多利亞時代文學」，爲選修、全學年、三學分之課程，然用紅筆劃去。

B、吳魯芹（吳鴻藻）授課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時間	開課內容	必選修	全／半	學分	年級	附註
民 43（1954）	新聞英語	選	全	2	3、4	下學期同
民 44（1955）	翻譯 A	選	全	2	3、4	
民 45（1956）	翻譯 A	選	全	2	3、4	
民 46（1957）	文學批評	選	全	2	4	
民 47（1958）	文學批評	選	全	2	4	
民 48（1959）	文學批評	選	全	2	4	
民 49（1960）	小說選讀 C	必	全	3	2	
	翻譯與寫作 C	必	全	2	4	
民 50（1961）	翻譯與寫作 B	必	全	2	4	
	英散文（三）B	必	全	2	4	

※ 資料來源：國立臺灣大學各學院科目表（國立臺灣大學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附錄四：

朱光潛主編《文學雜誌》各期首排論著作者篇目表

卷期	年月	作者	篇名	備註
1:1	1937.5.1	朱光潛 葉公超	發刊詞〈我對於本刊的希望〉 〈論新詩〉	作者爲北大西語系教授 作者爲清華外文系教授
1:2	1937.6.1	知堂（周作人）	〈談俳文〉	作者爲北大中文系教授
1:3	1937.7.1	陸志韋	〈論節奏〉	作者爲燕京大學代理校長
1:4	1937.8.1	錢鍾書	〈中國固有的文學批評的一個特點〉	作者當時在牛津大學進修
2:1	1947.6.1	編者 朱自清	〈復刊卷頭語〉 〈古文學的欣賞〉	作者爲清華中文系教授
2:2	1947.7.1	朱光潛	〈看戲與演戲—兩種人生理想〉	作者爲北大西語系教授
2:3	1947.8	聞一多遺著	〈端午考〉	作者爲西南聯大中文系教授
2:4	1947.9	李長之	〈李清照論〉	作者爲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
2:5	1947.10	聞一多遺著	〈廖季平論《離騷》〉	作者爲西南聯大中文系教授
2:6	1947:11	朱光潛	〈蘇格拉底在中國(對話)〉	作者爲北大西語系教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2:7	1947:12	陸志韋	〈從翻譯說到批評〉	作者爲燕京大學代理校長
2:8	1948.1	盛澄華	〈紀德的藝術與思想的演進〉	作者爲清華大學外文系教授
2:9	1948.2	陸志韋	〈從翻譯說到批評(續)〉	作者爲燕京大學代理校長
2:10	1948.3	朱光潛	〈詩的意像與情趣〉	作者爲北大西語系教授
2:11	1948.4	李廣田	〈愛侖坡的《李奇亞》〉	作者爲清大中文系教授
2:12	1948.5	游國恩	〈屈原文藝論〉	作者爲北大中文系教授
3:1	1948.6	羅大岡	〈街與提琴〉	作者爲南開大學外文系教授
3:2	1948.7	馮至	〈從秦州到成都〉	作者爲北大西語系教授
3:3	1948.8	馮至	〈杜甫的童年〉	作者爲北大西語系教授
3:4	1948.9	朱光潛	〈遊仙詩〉	作者爲北大西語系教授
3:5	1948.10	浦江清	〈朱自清先生傳略〉	作者爲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 本期爲「朱自清先生紀念特輯」
3:6	1948.11	馮至	〈杜甫在梓州閬州〉	作者爲北大西語系教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Hsia Tsi-an, *Literary Review*, and Taiwan University: On Taiwan 'academic' literary journals and their interaction with the 'Cultural Field' and the 'Educational Space'

Mei, Chia-ling*

Abstract

Literary Review, founded by Hsia Tsi-an,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literary journals of the 1950s in Taiwan, but many commentators have referred to it only in relation with the slightly earlier *Free China* and the 1960s magazine *Modern Literature*.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broaden the perspective and sets out from the interaction of the 'cultural field' and the 'educational space': How did Hsia Tsi-an and his *Literary Review* make use of the resources and the support available at Taiwan University – an educational space engaged in both elite training and academic research – to promote change in the cultural field? And what were the effects of this venture on academic education, on the dynamic of interactions and mutual influences of the cultural field and the educational space, their dialogue and their common growth? As an 'academic' journal, *Literary Review* placed itself in the tradition of Zhu Guangqian's pre-war journal of the same name, yet it also went beyond its predecessor, promoting ideas such as a "theory-informed literary creation" and "welcoming translated literature," thus laying the groundwork for a new tradition in Taiwan. This is where the significance of *Literary Review* for Taiwan literary and cultural history lies.

Keywords：Hsia Tsi-an; *Literary Review*; Taiwan University; Academic literary journals; Educational space; Cultural field.

* Professor,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